

# 现代中国的日本研究：以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变迁为基础的发展特征分析

[日]园田茂人，东京大学教授

(译者：丁诺舟，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 一、前言

广义而言，社会科学视角下的地区国别研究起源于冷战期间(Tzeng, 2018; Okano, 2018)。然而日本的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则早在二战之前就已出现。明治时代之前产生的汉学传统、进入昭和时代后出现的帝国主义扩张野心与殖民地经营的实际需要等历史要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日本亚洲研究的不断发展。

纵观世界的日本研究界，研究者的生活、研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方向与研究风格。美国的日本研究起源于二战中的实际战略需求，成熟于二战结束之后，在日本占领政策和所谓“反共防波堤”的构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Oguma, 2018:23)。东南亚的日本研究则主要源于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经济发展动力的关注，以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做出的不懈努力(Thang, 2018:76-80)。韩国与中国台湾则将日本研究置于“去殖民地化”这一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二者的日本研究在质与量上都呈现出长足进步(Lee, 2018:102; 李, 2016:43)。澳大利亚的日本研究虽标榜“反欧洲中心论”，却依然保有英语圈日本研究的固有特征，也有澳大利亚学者质疑是否真正存在澳大利亚独特的日本研究范式(Stevens, 2018:133)。上述学者在著作中不约而同地指出，世界各国的地区国别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受该国的地缘政治局势以及学会、研究机构等制度性因素制约。

然而，进行日本研究的毕竟是研究者个人，地缘政治局势与各种制度只不过创造了研究人员的训练与活动环境。无论政府设立何种奖励措施来鼓励对某领域进行研究，如果本国国民对此不感兴趣，研究人员不认为该领域称得上学术研究

对象，针对该领域的研究就不可能发展进步。因此，决定各国日本研究兴衰的基础要素是研究人员个体。研究人员具备何种特征，以何种方式结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在该国的知识生产体系中占据何种地位，这些要素在考察该国的日本研究状况时至关重要。

然而，几乎没有学者在分析各国研究人员特性的基础上，探讨该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特征。仅有 Steinhoff (2013) 的论文概述了美国的日本研究人员特征。<sup>1</sup>幸运的是，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已先后组织过两次大规模调查，主要的日本研究机构以及大部分日本研究人员的信息得到数据化与汇总。

本报告以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为分析对象，在考察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成长轨迹的同时，也将探讨其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难题。

## 二、数据来源

本报告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主持进行的两次调查（2009 年的调查合作者有中华日本学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2018 年的调查是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与中国多家日本研究学会合作进行的，也得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大力支持）所获得数据为基础撰写。两次调查的结果分别以《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09）参考资料》（2010 年 5 月）和《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18）参考资料》（2019 年 2 月）为题编辑为资料集用于学术交流。两部资料集均以名单的形式收录了中国的主要日本研究学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員信息。为便于分析研究，本报告将上述信息数据化后组建数据库，以数据库信息为主进行论述。

数据库分为研究机构与研究人员两类。研究机构数据库主要收录五项信息，分别为：（1）机构名称（2）机构所在省（3）设立年份（4）主要研究领域（含 2009 年信息与 2018 年信息两项）（5）任职于该机构的教师、研究员人数（含 2009 年信息与 2018 年信息两项）。2009 年调查涵盖 100 所研究机构信息，2018 年则扩展至 118 所。在两次调查中均提供信息的机构有 88 所，其余机构仅出现于某一次调查结果中，因而两次调查实际涉及研究机构 130 所。上述机构中有 8 所为

---

<sup>1</sup> 此类研究需要三项基本条件，即可分析的数据源、一定数量的日本研究人员以及研究人员名单。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于 2012 年委托 Steinhoff 对美国的日本研究状况进行调查，获取了 1039 名日本研究者的数据信息，因而 Steinhoff 能够分析美国的日本研究人员的特性。

成员超过 300 人的学会组织，不属于本报告的分析范畴。

研究人员数据库包含六项主要信息，分别为（1）出生年月（2）性别（3）所属机构与职称（含 2009 年信息与 2018 年信息两项）（4）获取学士/硕士/博士的时间及国别（5）主要研究领域（存在涉及多领域者，含 2009 年信息与 2018 年信息两项）（6）主要成果（三项以下）的发表时间、语言、国别、是否独立作者（含 2009 年信息与 2018 年信息两项）。信息既包含研究人员的个人信息，也包括研究成果等学术信息。2009 年获取研究人员个人信息 1041 份，2018 年则增至 1609 份，两次调查均提供信息的研究人员为 938 人，至少在一次调查中提供信息的研究人员为 1712 人。<sup>2</sup>为了了解日本研究的实际状况，此次调查将范围限定为以有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研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为主，还有 2009 年调查的对象者和大规模的学会会员。<sup>3</sup>

两次调查均以自由填写的问卷为调查手段，不设必填项，因而一部分信息存在缺失现象。因此，在按信息类别绘制表格进行分析时，可利用样本一般少于总样本数。<sup>4</sup>添加了相关信息并汇入 Excel 文档。笔者将其转换为 SPSS 格式，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制成数据库。<sup>5</sup>本报告以此数据库为基础撰写。后文应分析需要，会同时引用 1984 年与 1995 年进行的同种调查结果。

### 三、研究机构变化概况

首先考察各研究机构呈现出的变化。

图 1 为研究机构设立年份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的设立时间集中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后的 1979 年至 198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均成立于此时。

---

<sup>2</sup> 后文会对研究人员的升迁状况进行分析，分析时仅将在两次调查中均提供了职位信息的研究人员作为分析对象。

<sup>3</sup> 本报告分析了研究人员的专攻领域，但由于数据采集的上述特征，日语和日语教育专业的研究人员数量可能低于实际状况。

<sup>4</sup> 数据化以保持原有信息为宗旨，仅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归纳或添加新内容。最难以数据化的是研究人员信息中的研究领域一项，调查信息过于琐碎，不利于统计分析，因而笔者将其分为八个类别。具体而言，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亚洲政治、东北亚地区国别研究、日本政治、日台关系等领域划归“政治·外交”，将日本经济、经济政策、日本金融、东北亚经济、中日经济比较划归“经济”，以此类推。笔者先制定了上述概念的对应表，数据化工作以此为基础进行。

<sup>5</sup> 数据录入工作开始于 2019 年 9 月，结束于同年 11 月，此后经历了数次清查工作，笔者于 2019 年 12 月中旬开始了分析工作。

第二个时期是 1999 年至 2004 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青岛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等大学的研究部门均在这一时期成立。1999 年，中国国务院批准公布了《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 1995 年的大学入学率为 7.2%，1998 年为 9.8%，为了振兴教育，计划在 2010 年前将大学入学率提高至 15%，自此大学进入扩招时期。日本研究机构的第二次成立高峰期与大学扩招期基本吻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持续增加。在高峰期一年最多成立五所机构，但在高峰期以外，每年也会成立一到两所机构，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 2019 年。日本研究机构的设置需要获得党和政府的批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国家意志。即使在中日两国因历史教科书问题和领土争端而关系恶化之时，日本研究机构依旧保持增长态势，这一特征值得特别关注。<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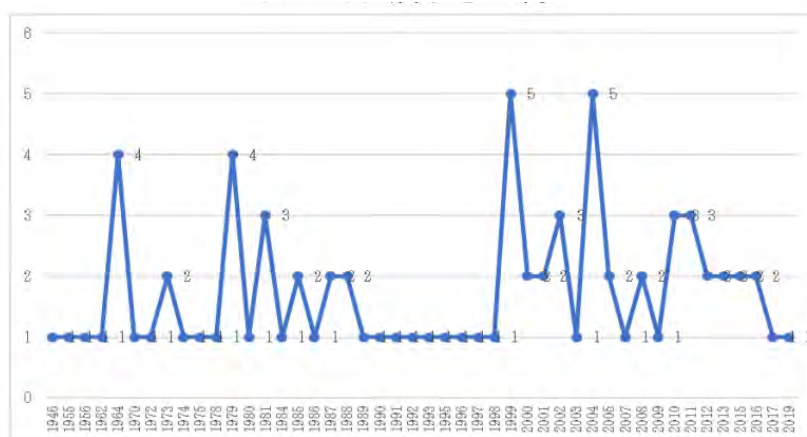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机构设立年份

其次，考察各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参考图 2）

<sup>6</sup> 研究机构的人员数量及覆盖研究领域与设立时间并无明显关系。2000 年-2010 年成立的机构平均人数最少，为 16.1 人，2010 年-2018 年成立的机构平均人数最多，为 22.9 人，二者差别不大，可以说研究机构的人数基本固定。在八个研究领域，各机构平均能覆盖两个领域，覆盖领域多寡同样与设立时间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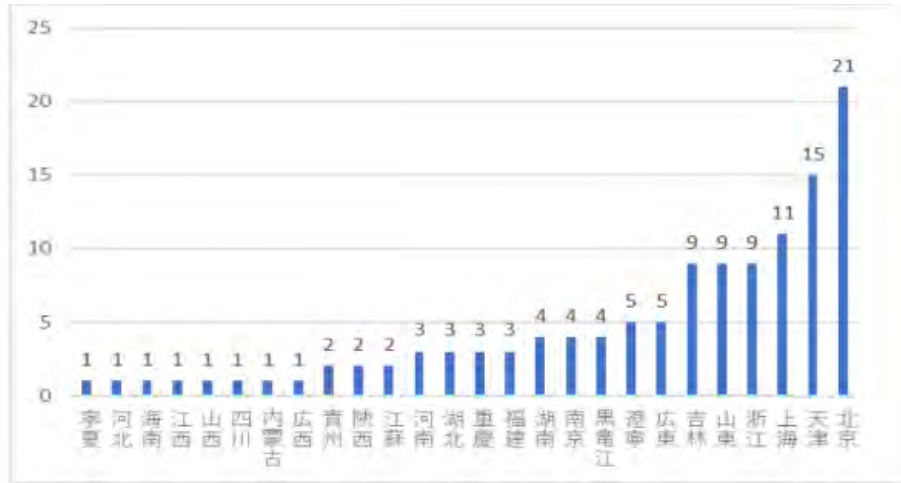


图 2 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2009 年调查数据显示，研究人员集中于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以及东北三省和其他某几个省份与都市<sup>7</sup>。这一状况在 2018 年调查时并无明显变化。然而，将研究机构创立时间与地区分布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则可以发现新的现象。1990 年以前开设的研究机构确实集中于三个直辖市与东北三省，但是 2000 年以后设立的研究机构则多分布于上述地区之外，换言之日本研究机构的分布范围不断扩展。

如图 3 所示，成立时间对研究机构可覆盖的研究领域多寡并无直接影响。<sup>8</sup> 日本研究机构最初集中于几个特定地区，之后逐渐向全国拓展。虽然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依然不平衡，但各地区均能覆盖主要研究领域，并未出现某一地区垄断特定研究领域的现象。

<sup>7</sup> 蒋立峰·杨栋梁：《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与展望》，载于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编：《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09）》（参考资料），2010 年，第 8 页。

<sup>8</sup> 37 名受调查者表示自己的研究领域为“法律与行政”，占全体的 2%，但没有研究机构表示可覆盖“法律与行政”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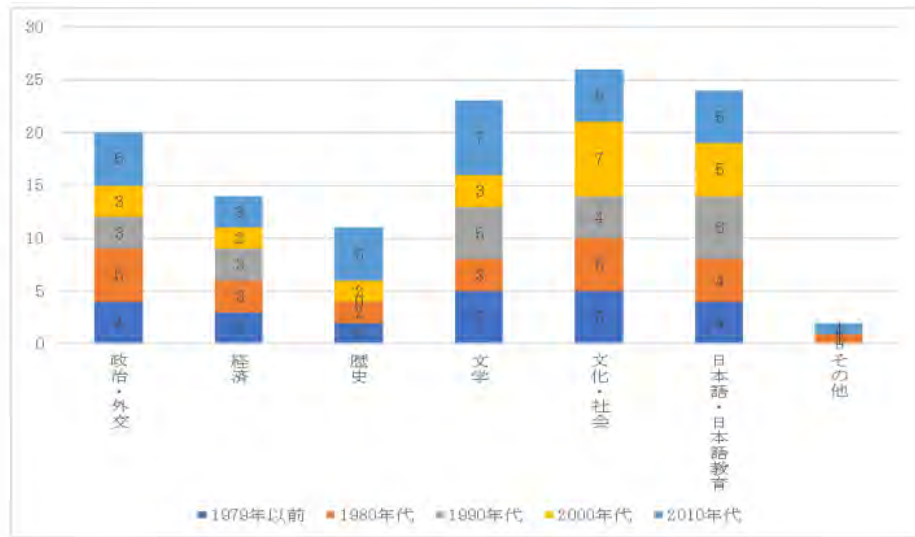


图3 各研究领域相关机构的成立时间

注：由于一个研究机构可能覆盖多个研究领域，因而合计数值超过研究机构总数。

## 四、研究者群体的变化

本章将从五个角度分析研究者群体呈现出的变化特征与趋势。

### 4.1 地理分布・年齢结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结构与代差

图4展示了研究人员所在单位的地理分布情况。北京、天津、上海三大直辖市在2009年已拥有众多日本研究者。截至2018年，上述三直辖市不仅又新增了60-70名研究人员，而且分别建起了各市的日本研究学会。其余各地区的日本研究者人数都有稳步增加，云南、安徽、新疆等没有专门的日本研究机构的地区也出现了日本研究人员。研究人员的地区分布与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证实了同一现象，即各地区间的日本研究能力依旧不均衡。

图5展示了研究人员的年龄分布状况。

2009年与2018年时隔9年，这一时间间隔造成的研究人员年龄变动在分布图中清晰可见。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的年龄分布并不均等，而是集中于某三个特定年龄段。具体而言，第一代日本研究者大多出生于1954年到1957年，幼年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第二代日本研究者多出生于1962年到1966年，他们考入大学的难度普遍低于第一代日本研究者。第三代日本研究者多出生于1978

年至 1982 年，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中，1999 年高等教育改革开始之时，他们恰好升入大学。上述三代研究者集团分别形成了小的研究核心。

在 2018 年调查之时，第一代研究者大多退居二线，第二代研究者开始成为学会领袖，指引学术研究方向，而第三代研究者多为副教授、副研究员，随时准备接过第二代研究者的接力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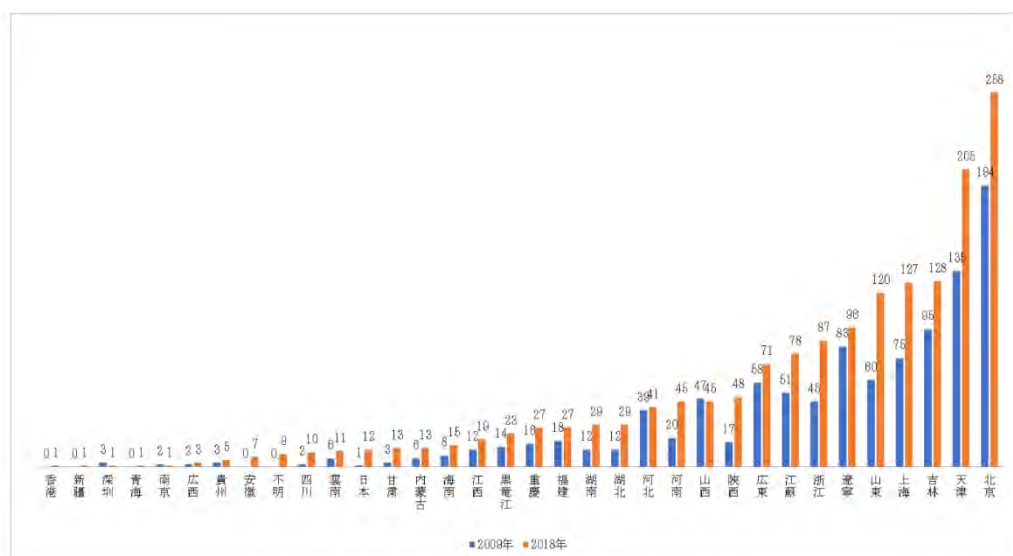


图 4 研究人员所在单位的地理分布<sup>9</sup>：2009-2018 年（单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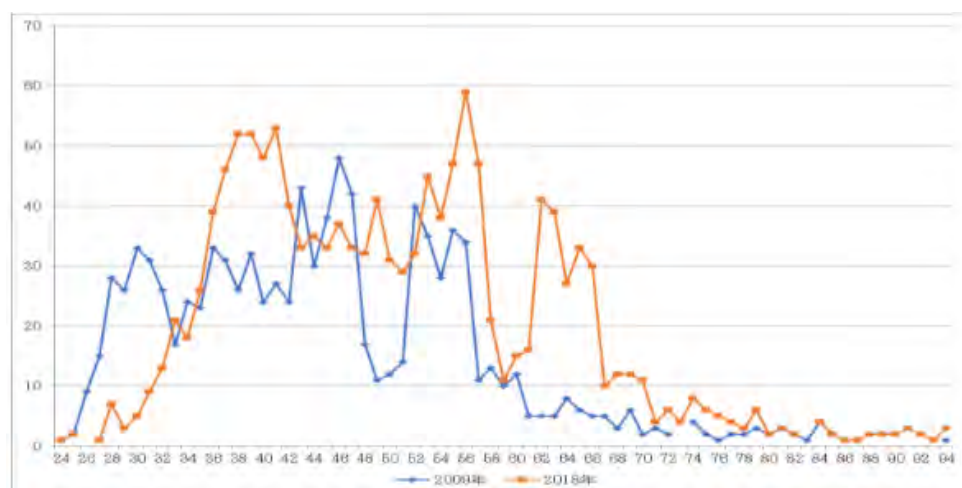


图 5 研究人员的年龄分布图：2009-2018 年（单位：人）

对比 2009 年与 2018 年调查数据的年龄分布状况可以发现，在 2009 年，第三代研究者大多集中在 25-35 岁区间，形成了青年研究集团。然而在 2018 年却

<sup>9</sup> 图中出现了日本、香港，因为本次调查只限于中国大陆，不应出现这两个地域，有的调查票，特别通过大规模学会发的调查票填写时可能把在日本的客员身份或曾在日本香港工作过的情况填写进去了。

不存在这一年龄区间的研究者集团。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 2018 年前后，只有拥有博士学位者才能进入研究人员队伍，而 25-35 岁的青年们大多还在为获取学位而奋斗，尚未成为公认的研究人员。其结果是青年研究集团不复存在。<sup>10</sup>

日本研究的具体研究方向亦出现变化，变化趋势同样值得关注。

表 1 涵盖了自 1985 年起进行的四次日本研究状况调查的结果。这一期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日本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三十余年间却没有明显变化。政治·外交与历史研究占全体的 20-30%，经济占 15% 左右，文学与日语·日语教育占 35-45%，文化·社会占 15%，其他研究方向占 5%。不同时间点的数据稍有差异，但总体而言没有明显变化。同时研究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一直维持在总数的 20% 左右。如图 3 所示，研究人员的专攻方向并没有因时代不同而产生明显变化。

11

然而，将研究方向与年龄分布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不同年龄段的研究人员的研究方向存在明显差异。

图 6 显示了 2018 年各研究方向学者的年龄分布，对 50 岁以下研究人员的比率进行分析可发现，日语·日语教育（58.7%）与文学（57.6%）的比率高于平均，而法律·行政（24.2%）和经济（32.6%）、政治·外交（33.1%）的比率则低于平均，存在中青年研究人员聚集于某一研究领域的现象。

表 1 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领域分布：1985-2018 年（单位：%）

	1985年	1997年	2008年	2018年
政治·外交	6	20	10.7	8.5
歴史	23		14.3	14.4
経済	18	17	14	11.3
文学	36	46	41.3	29.3
日本語・日本語教育			4.4	16.3
文化·社会	12	16	12.7	17.5
法律·行政			2.5	2
その他	5		0.1	0.6

注：1985 年与 1997 年的数据引自杨（2018：4）

<sup>10</sup> 此结论有待商榷。如后文所述，众多中国学生前往日本攻读博士学位，而这些学生不是本次调查的调查对象。因此，收录进名单的青年研究者人数可能低于实际。

<sup>11</sup> 经济与历史的占比小幅减少，日语·日语教育和文化·社会的占比呈减少趋势，但均在误差范围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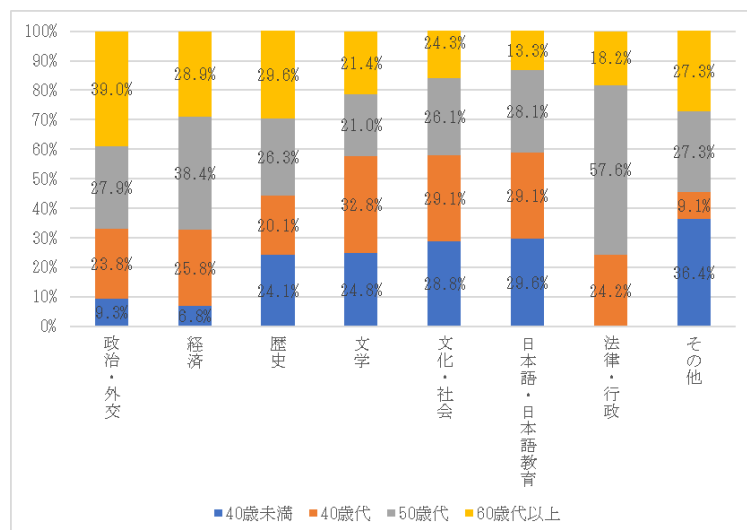


图6 主要研究领域的年龄分布：2018年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的日本研究者群体同时存在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工作地区与研究方向稳定不变，第二个特征是不同年龄段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差异明显。<sup>12</sup>

#### 4.2 获取学位的时间与地点：国内培养博士与海归博士并存

接下来将焦点转向研究人员获取学位的时间与地点。

一般而言，在知识进口阶段，研究人员主要由海外的教育科研机构进行培养，因而在海外获取学位的研究者占比会不断提高。随着本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国内也逐渐可以自主培养研究人员，在国内获取博士学位后，同样可以进入研究者队伍。但是，本土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迟迟难以提升，大量的青年研究者依然倾向于在外国获取学位，其结果是学术研究难以实现本土化。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集中投资发展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分析中国的日本研究者于何时何地取得学位，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的培养状况。

图7显示了截至2018年，硕士、博士学位拥有者人数的时间推移。<sup>13</sup>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是成为研究人员的基本条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硕士、博士学位拥有者的人数稳步提高，日本研究的基础逐步确立。同时，硕士与博士

<sup>12</sup> 这一现象的合理化解释是法律・行政与经济、政治・外交等领域的入门门槛较高，必须到达一定年龄才能从事此方向的研究。然而从2018年的调查数据可知，获取学位的时间与年龄并无明显相关性。

<sup>13</sup> 虽然调查数据包含2018年获取学位人员的信息，但未填写此项信息的人员过多，因而不属于本报告的研究范围。

的增长曲线高度吻合，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硕士会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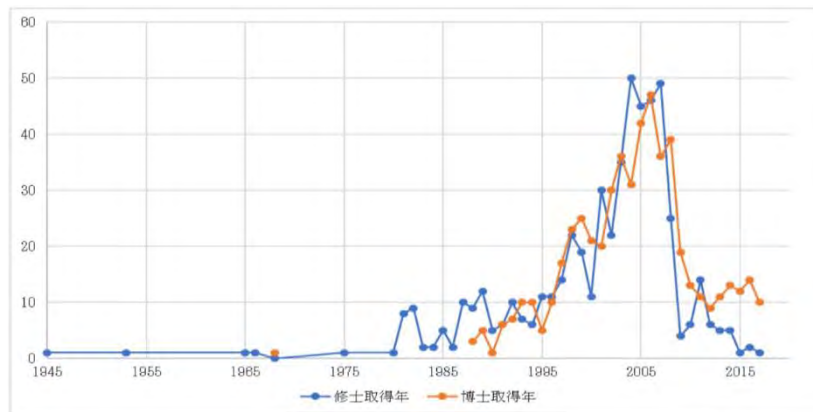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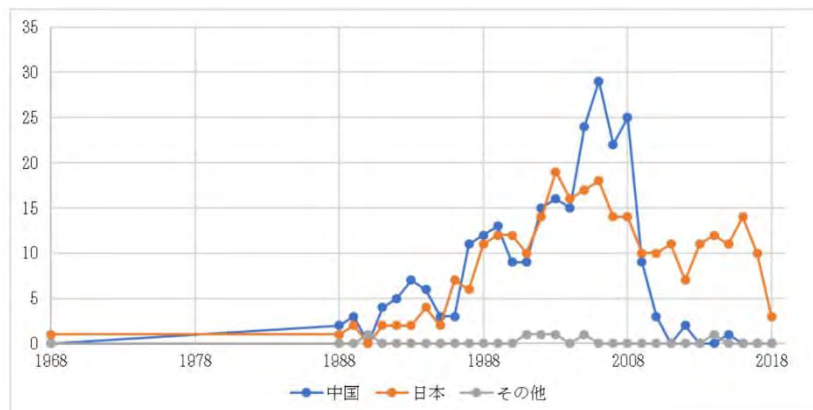


图7 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年份：截至2018年9月（单位：人）

然而，如果仅考察博士学位的获取地点，则会得出不同结论。1980至2005年，在日本获取博士学位与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基本相同。2005-2010年，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到达顶点，表面上看，学位授予开始呈本土化趋势。然而2010年以后，形势出现反转，在日本获取学位的人数不断增多，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参考图8）。<sup>15</sup>中国学生的个人意愿、中国教育机构鼓励留学的政策、日本各大学吸引留学生的优惠政策、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选拔研究人员的方针等诸多要素共同造成了这一趋势。其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本土培养研究人员，国内培养博士与海归博士并存的状态长期持续。

图9展示了各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获取博士学位的比率。文学（31.5%）与日语·日语教育（43.4%）的比比较低，法律·行政（76.5%）和历史（65.7%）的比率高。青年研究人员集中的研究领域，恰是博士学位取得率较低的领域。



<sup>14</sup> 以2009年为拐点，数值呈下降趋势的原因是30岁左右的博士尚未获得固定的研究型工作，因而没能成为此次调查的对象，并不意味着日本研究者数量呈下降趋势。

<sup>15</sup> 在日本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于2003年到达顶点。此后，在中国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不断减少，造成二者的差距不断增大。

图 8 获取博士学位地点的年代推移图：截至 2018 年（单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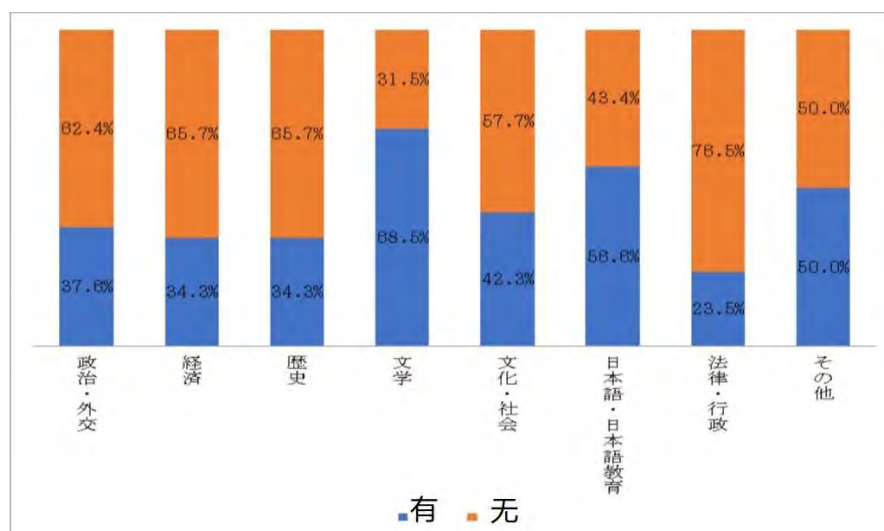


图 9 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获取博士学位比率：截至 2018 年

### 4.3 研究者群体中的性别：女性研究者增加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少子化现象的突显，中国的日本研究者的性别比率及其发展趋势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图 10 显示了截至 2018 年，研究人员的年龄分布与性别分布。以 55 岁为分水岭，男女人数比存在明显差异，青年研究者中女性的占比不断增加。60 岁以上的研究者中四分之三是男性，而不满 50 岁的研究者中女性占 63%。

女性研究者的增长趋势在某几个研究领域显得尤为明显。图 11 展示了截至 2018 年，各研究领域的男女比率。日语・日语教育与文学领域的女性占比较高，这两个领域同时也是无博士学位者和青年研究者集中的领域。中国的日本研究过去主要由男性研究者承担，这一状况不断发生变化，女性开始成为日本研究的重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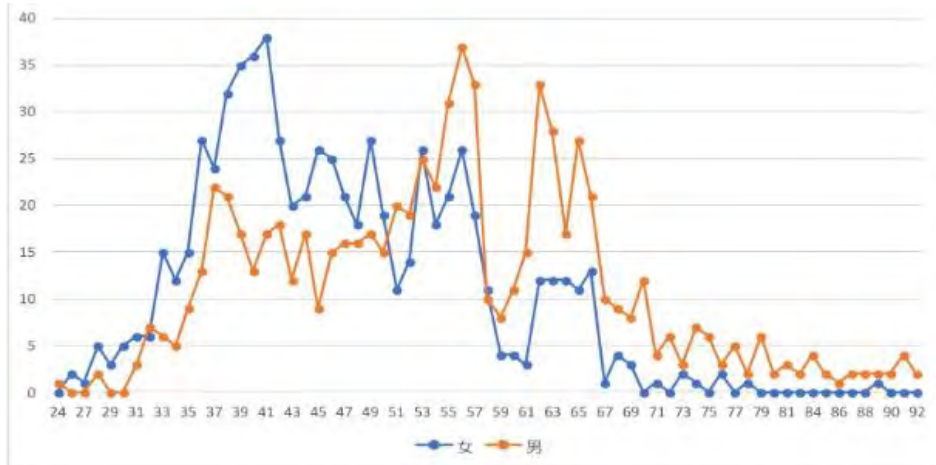


图 10 男女年龄构成比：截至 2018 年（单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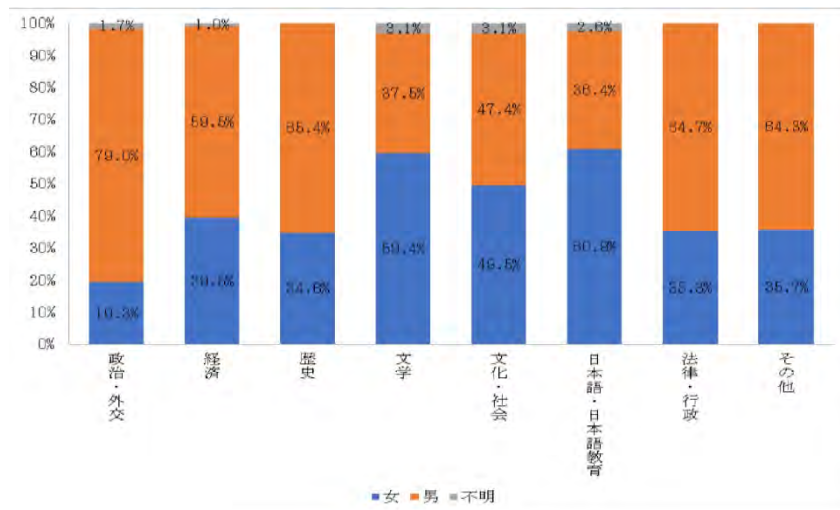


图 11 不同研究领域男女比：截至 2018 年

#### 4.4 研究成果发表语言与发表国别：明显的本土化倾向

4.2 节探讨了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在何处获取博士学位，那么发表研究成果时使用的语言以及发表地是否存在同样状况呢。本节将以论文发表语言与发表国别为中心进行分析。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在中国用汉语发表研究成果的学者不断增多，在外国使用外语（以日语为主）发表论文的数量则长期保持稳定（参考图 12 和图 13）。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无论研究哪一领域，所有学者均明显呈现出上述本土化倾向，这构成了现代中国日本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换言之，研究人员通常将中国人预设为研究成果的目标读者，因此较少使用日语和其他语言，向外界发声。

截至 2018 年，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只有 2% 的作品使用外语（包括日语）写作，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发表代表作的数量则仅占总数的 8%。由于中国本身拥有庞大的知识消费市场，因此研究成果出现本土化倾向不足为奇。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日本研究与海外的日本研究，或更准确的说是华人以外的海外日本研究的交叉点相对较少。<sup>16</sup>



图 12 主要研究成果发表语言的时间推移：截至 2018 年<sup>17</sup>（单位：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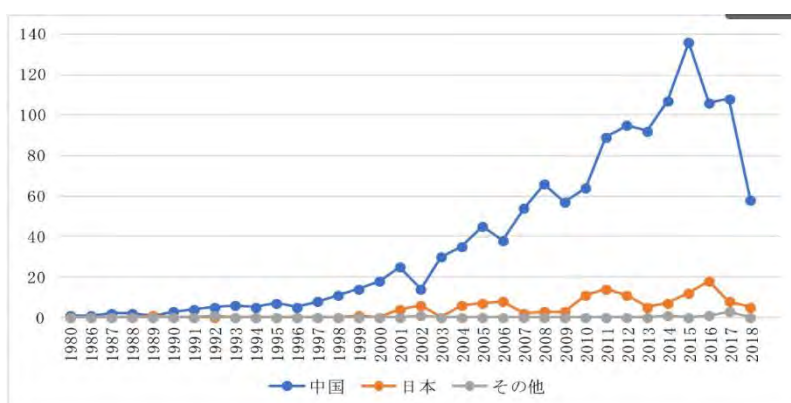


图 13 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国别的时间推移：截至 2018 年（单位：篇）

#### 4.5 影响晋升的要因：成果至上主义的扩大

在 2009 年与 2018 年两次调查结果中，研究者个人可能发生的最大变化莫过于职称。研究九年间日本研究人员的晋升状况，可以推知中国如何评估与考核本国的日本研究者。

图 14 显示了两次调查中都填写了职称信息的 880 名日本研究人员的晋升状

<sup>16</sup>这一趋势不仅存在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日本研究界也存在着同样现象。已有众多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台湾缺乏与海外，特别是日本的研究合作。参见（岡崎，2014；李，2016）。

<sup>17</sup>2018 年调查收录了各研究人员三项主要研究成果，本图仅以每位研究人员的第一项研究成果为数据进行分析。第二、第三项研究成果的分布图与本图呈相同趋势，如果将全部研究成果进行统计分析，则本图的纵轴会过长，因此仅收录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分析。

况。九年间实现晋升的有 234 人，占全体的 24.4%。换言之，参与调查的研究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晋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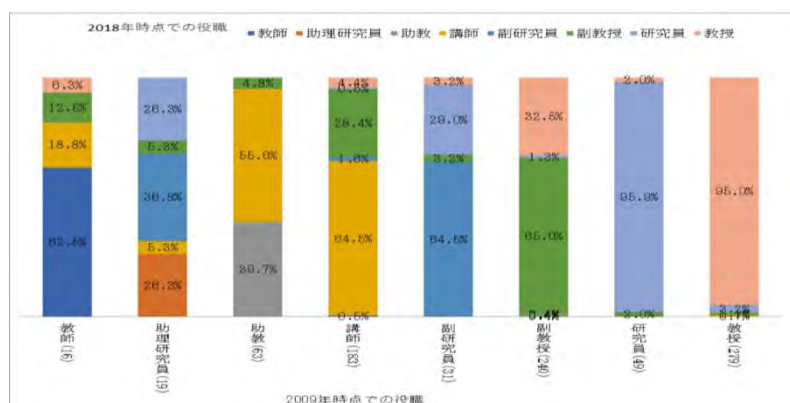


图 14 职称变化：2009-2018 年

通过对现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判断获得晋升的研究者所具备的共同特征。

因变量为 2018 年的职称减去 2009 年职称的数值，共设六个解释变量，分别为 (1) 是否拥有博士学位 (虚拟变量)，(2) 年龄层 (不满 40 岁=1, 60 岁以上=4, 共设四级数值)，(3) 研究领域 (各研究领域设为虚拟变量)，(4) 研究成果发表国 (虚拟变量，中国=1)，(5) 研究成果发表语言 (虚拟变量，汉语=1)，(6) 性别 (虚拟变量，男性=1)，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决定晋升的要素：2009-2018 年

	B	标准误差	回归系数	T 值	假设几率
定量	0.77	0.19		4.13	0
虚拟变量：拥有博士学位=1	0.39	0.08	0.18	5.11	0
年龄层	-	0.04	-	-	0
虚拟变量：政治·外交=1	0.1	0.12	0.03	0.81	0.42
虚拟变量：经营·经济=1	0.16	0.12	0.06	1.37	0.17
虚拟变量：历史=1	0.14	0.11	0.05	1.27	0.2
虚拟变量：文学=1	0.02	0.11	0.01	0.16	0.88
虚拟变量：文化·社会=1	0.16	0.1	0.06	1.61	0.11
虚拟变量：日语·日语教育=1	-	0.13	-	-	0.2
虚拟变量：日语·日语教育=1	0.17	0.13	0.04	1.28	0.2
虚拟变量：法律·行政=1	-	0.22	-	-	0.57
虚拟变量：法律·行政=1	0.13	0.22	0.02	0.57	0.57
虚拟变量：其他=1	0.37	0.59	0.02	0.62	0.53
虚拟变量：研究成果发表国/中国=1	0.44	0.2	0.12	2.18	0.03

虚拟变量：研究成果发表语言/汉语=1	- 0.06	0.2	- 0.02	-0.3	0.76
虚拟变量：男性=1	- 0.06	0.08	- 0.03	- 0.76	0.45

$R^2=0.133$ , Sig=.000

注：因变量为 2018 年的职称减去 2009 年职称的数值。

决定系数为.13，数值偏小，因此无论下何结论均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依然可以看出中国的晋升体系存在着明显的“成果至上主义”色彩。研究领域、性别、研究成果发表语言对晋升几乎没有影响，而拥有博士学位并在中国国内发表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者则有更多升职机会。<sup>18</sup>

## 结语

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逐年递增，虽然地区分布不均的现象依旧存在，但各地研究机构能够覆盖的研究领域稳步扩大。同时，并没有出现某一地区专门研究某一领域的过度集中现象，各研究领域均保持着相对平衡的发展态势。

日本研究者群体同时存在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工作地区与研究方向稳定不变，第二个特征是不同年龄段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差异明显。众多女性研究者加入研究队伍，在文学和日语·日语教育领域，女性研究者的比例相对较高。可以预见，女性研究者在全体研究者中的占比将继续上升。

拥有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持续增加，而 2010 年后，在日本获取博士学位的人数开始超过中国本土，中国并没有实现只在国内培养研究人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拥有庞大的知识消费市场，中国的日本研究者倾向于在中国的杂志上用汉语发表研究成果，可以说“日本研究的中国化”在稳步发展。拥有博士学位，且在中国国内发表研究成果的年轻研究者容易升职，性别与研究领域并不构成晋升的障碍，因此中国的研究人员晋升标准体现了明显的成果至上主义。

中国的日本研究在成长过程中呈现出如上特征，这些特征本身值得肯定。然

<sup>18</sup>对于使用日语或英语在海外发表研究成果对晋升影响较小的问题，中国国内似乎存在质疑的声音。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中国的日本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满足国内的知识需求，而非向海外发生，因而出现这一问题不足为奇。

而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诸多新趋势，例如研究发展的地区专门化(刘，2015:35)、研究活动国际化、以及世界规模协同研究(刘，2015:35)。要妥善应对上述新趋势，中国的日本研究依旧面临诸多待亟待解决的课题。同时，2010年以后，在中国国内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人员呈下降趋势，这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中国的日本研究界面临的问题主要有：(1) 如何避免中国国内的博士生导师出现青黄不接现象。(2) 如何鼓励、支持青年研究人员开拓的新研究领域。(3) 如何构建适合女性研究者的工作体制。(4) 如何在成果至上主义评价体制下，真正实现研究质量的提高。上述问题均有待中国的日本研究界慎重思考与解决。

从研究者的规模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与美国不相上下的日本研究大国。笔者作为国际日本研究的摇旗手，今后也会继续关注中国的日本研究的发展状况。

### 主要参考资料：

#### 中文

1. 蒋立峰·杨栋梁：《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与展望》，载于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编：《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09）》（参考资料），2010年。
2. 刘岳兵：『中国式日本研究的实像与虚像：重建中国日本研究相关学术传统的初步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 林昶：《“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与未来”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2014，[http://ijs.cssn.cn/xsdt/xshy/201611/t20161122\\_3284740.shtml](http://ijs.cssn.cn/xsdt/xshy/201611/t20161122_3284740.shtml)。

#### 日语

1. 岡崎幸司：「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研究：国際学術ネットワークと台湾の日本研究者」『立命館文學』立命館大学人文学会，第640号，2014，第15-25頁。
2. 楊棟梁：「中国の日本研究の現状と展望」国立研究開発法人科学技術振興機構中国総合研究交流センター編『中国の日本研究』報告書，2016，第1-16頁。  
[https://spc.jst.go.jp/investigation/downloads/r\\_2016\\_07.pdf](https://spc.jst.go.jp/investigation/downloads/r_2016_07.pdf)。
3. 李世暉：「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研究の現状と挑戦：社会科学領域に関する一考察」『問題と研究』第45卷第1号，2016，第39-66頁。

#### 英语

1. Lee, Duck-Young, 2018, “Japanese Studies in South Korea,” in Okano, Kaori and Yoshio



- Sugimoto eds., *Rethinking Japanese Studies: Eurocentrism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Routledge.
2. Oguma, Eiji, 2018, "Studying Japan as 'the other': A Short history of Japanese Studies and its future," in Okano, Kaori and Yoshio Sugimoto eds., *op.cit.*
  3. Steinhoff, Patricia G., 2013, "A Demographic Profile of Japan Specialists,"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View from 2012* (Japanese Studies Series XXXX), The Japan Foundation, pp. 20-39.  
<http://japandirectory.socialsciences.hawaii.edu/Assets/Volumes/2013%20monograph%20final.pdf>
  4. Stevens, Carolyn S., 2018, "Australia's view of Japan, as seen from Japanese Studies," in Okano, Kaori and Yoshio Sugimoto eds., *op.cit.*
  5. Thang, Leng Leng, 2018, "Developing Japanese Studies with a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in Okano, Kaori and Yoshio Sugimoto eds., *op.cit.*
  6. Tzeng, Albert, William L. Richter and Ekaterina Koldunova, 2018, *Framing Asian Studies: Geo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SEAS.